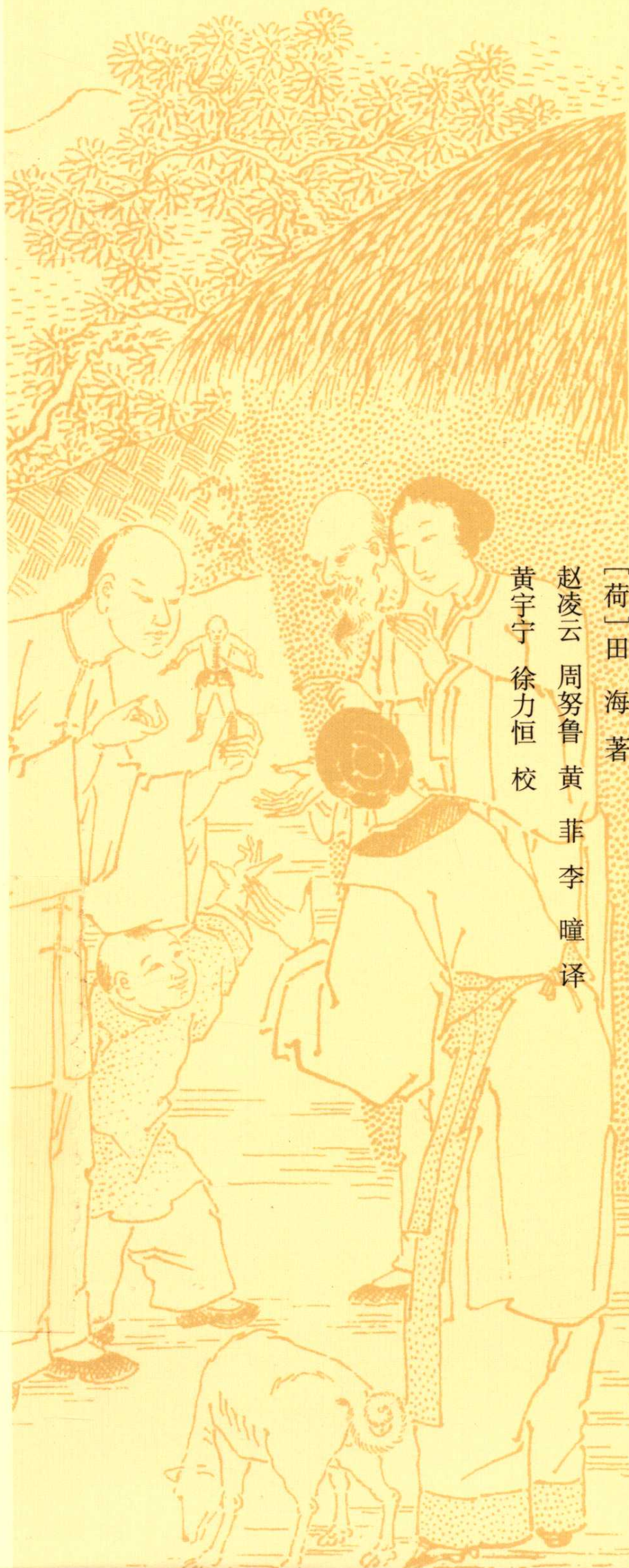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讲故事： 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Barend ter Haar

〔荷〕田海著

赵凌云 周努鲁 黄菲 李瞳译

黄宇宁 徐力恒校

中西書局

非外傳



讲故事：
中国历史
上的巫术与替罪

〔荷〕田海著

赵凌云 周努鲁 黄菲 李
黄宇宁 徐力恒 校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 [荷] 田海著.
—上海：中西书局，2017.4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75 - 1121 - 3

I. ①讲… II. ①田… III. ①巫术-研究-中国
IV. ①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8183 号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荷] 田海著

赵凌云 周努鲁 黄菲 李瞳译

黄宇宁 徐力恒校

责任编辑 伍珺涵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34 000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75 - 1121 - 3 / B · 076

定价 68.00 元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主编机构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浙江大学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

总策划 (Co-editors-in-chief)

圣 凯 陈金华 孙英刚

主 编

孙英刚

学术指导委员会 (Advisory Board)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清华大学)

王邦维(北京大学)

太史文 Stephen Teiser(普林斯顿大学)

田海 Barend ter Haar(牛津大学)

妙江(五台山佛学与东亚文化国际研究院)

怡学(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荣新江(北京大学)

柏夷 Stephen Bokenkamp(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高田时雄(京都大学)

傅飞岚 Franciscus Verellen(法国远东学院)

傅敏怡 Michael Friedrich(汉堡大学)

赖永海(南京大学)

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复旦大学)
冯国栋(浙江大学)
圣凯(清华大学)
刘屹(首都师范大学)
刘震(复旦大学)
池丽梅(鹤见大学)
孙英刚(浙江大学)
李建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连马丁 Martin Lehnert(慕尼黑大学)
吴疆(亚利桑那大学)
何欢欢(浙江大学)
何善蒙(浙江大学)
沈丹森 Tansen Sen(纽约市立大学)
张德伟(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陆扬(北京大学)
陈金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林鸣宇(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金延美(耶鲁大学)
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斯坦福大学)
俞永峰 Jimmy Yu(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高万桑 Vincent Goosaert(法国国家科学院)
宽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龚隽(中山大学)
程正(驹泽大学)

总 序

佛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是中国文明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如同学术世界中的十字路口,中西交通、艺术史、政治史、宗教信仰、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等领域,都与之紧密相关。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和思想上的原因,比如现代学科的机械划分,使得对佛教及中国其他宗教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仍较为薄弱,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研究领域亟待拓展,新的史料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解读,研究的方法也需要进行更新。以宗教研究为着力点,不但可以有效地推动和拓展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明演进的脉络及其特质,乃至对中国社会精神在当下的进步,都会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国内外相关单位和学术同仁的支持下,“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将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以传译域外佛教研究为主,同时也引进国外的中国其他宗教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在不懈的努力下,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西方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稍稍改变目前令人失望的欠规划、缺规模、重复生产、缺乏创新的局面。通过这一丛书,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国内外学者间的了解、切磋与合作。参与翻译的年轻学者,很多都展现出在相关领域令人赞叹的潜力,翻译的过程也将是这些年轻学者向国外学者深入学习的过程。

本丛书目前主要推动的领域如下:(1) 佛教思想与哲学;(2) 中古佛教史;(3) 佛教社会史;(4) 佛教物质史、艺术史;(5) 内亚文明对中国佛教的影响;(6) 中外交通与佛教;(7) 东亚佛教;(8) 南亚佛教;(9) 佛教戒律、感通、教义、寺院生活;(10) 道教及其他宗教;(11) 其他相关领域。

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没有风吹,也会凋落,何况在现今急功近利、躁动不安的时代。但是喧嚣过后,能够沉淀下来的,也许才是最为

珍贵的。知易而行难，做一件事并不容易，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排除障碍上。但是世间的事本就如此，也因之才知道得来不易。非常感谢一路上向我们施以援手的学界同仁，也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这套丛书最后能够在喧嚣中沉淀下来，对知识的创新、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洗涤起到一点点作用。

丛书编委会

(孙英刚执笔)

序 言

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不论是研究文学、社会、政治、宗教乃至经济,都永恒不变地忙于故事和叙事。这些故事或叙事记载于官方文件、编年史料、个人传记或者其他文本之中,但是绝大多数最终都能追踪到某个人讲述的一个故事。然而,我们几乎很少将这些故事的传播过程作为我们清晰的研究对象。本书执著于研究一类特殊题材的故事,即那些在几天或者几星期内就传遍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且经常被界定为谣言的故事。这类故事很容易遭到忽视,因为它们往往被贴上“谣言”和“传闻”的标签,进而暗示它们并不是真的,因而也就与历史真相无关。从现代或者西方角度来看,我的确很难宣称我探讨的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它们确实是真实的,而且和当时的观察者高度相关。“谣言”之类的标签往往是后来才被贴上的。

此类故事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是如此荒谬,以至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关注者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类故事也引发了可见而持久的活动,比如将怪兽驱走的仪式,直接抓捕作恶者或者施放邪恶巫术者(最起码是一些谣言制造者)甚至将其打死的举动,或者更加正式地,将这些嫌犯带到地方官面前接受审判。在本书中,笔者列出了很长的表格来证明此类事件发生得多么频繁。^① 作为人们关注此类故事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纬度来追踪考察它们。我们可以追踪地方社会如何应对这些故

^① 同时我也接触到其他有关此类材料的研究,尤其是徐茂明已经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谣言与秩序——光绪二年江南系列谣言案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年4月;以及《明清以来江南妖术恐慌的衍变及其社会根源》,《史林》2012年第3期。另收入[德]柯若朴(Philip Clart)主编《中国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研究之中欧视角》,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

事提到的威胁，这些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以多快的速度传播，此类隐晦的叙事及信仰结构在几个世纪中是如何变迁的。

当我在进行我的研究时，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从那时开始，更多的工作被完成了。^① 特别是 Steve Smith 所作的研究，从我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他主要关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十年中出现的谣言和传闻。^② 笔者认为口耳相传——不管我们称其为谣言或者别的东西——是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还认为，理解地方社会生活的这一重要层面，对当时人和历史学家来说，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禁止谣言的流传反而会带来更多谣言，因此研究此类大规模的社会传播行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本书中，笔者也对此类故事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给予了关注。笔者相信，这些叙事结构或模式过去能、现在依然能广泛而迅疾地传播，因为它们建立起并建立于更大的叙事和实践的基础。令笔者感到惊奇和兴奋的是，这意味着，追踪西方有名的“小红帽”的故事（夏尔·佩罗的版本及其更早的口头版本）及“狼与七只小山羊”（格林兄弟的版本）等，可以展现中国口头故事传统的重要性。^③ 同样地，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以及可能过多的篇幅讨论的不同故事的背景都显示，它们在一个文化语境中发挥作用。相反地，尽管这些故事在现代读者面前第一次出现，但它们实际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叙事。

理解口头文化的命运远远超出了社会史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范畴，因

① 例如收录到以下论文集集中的几篇论文：Jack Wei Chen and David Schaberg eds., *Idle Talk: Gossip and Anecdote in Traditional China* (Berkeley: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② “Fear and Rumou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Volume 5, Issue 3 (2008) 369 – 288; “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 the Politics of Holy Water (*Shenshu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66”, *China Quarterly* 186 (Dec. 2006) 999 – 1022 and “Talking Toads and Chinless Ghosts: the Politics of Rum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 – 6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2 (2006) 405 – 27.

③ 其他有关的观点，参看 James J. Tehrani, “The Phylogeny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PLoS ONE* 8(11) (2013), DOI: 10.1371/journal.pone.0078871。我仍未仔细研究他的分析进而判断是否需要提出自己的结论。他提到了我的研究，尽管把我的姓引错了。

为讲故事是人类互动的基础。所有的知识和信息,无论情况好坏,都会以口头叙事的形式传播,而非现代学者——比如笔者自己——喜欢制造的抽象符号系统和论述。这对于我们理解由宗教驱动的叛乱的根源非常重要。这些叛乱经常伴随着各种谣言,比如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世界末日性质的大灾难即将降临等。对盗贼侵扰和入侵的恐惧一类的谣言,跟本书选择研究的更加荒谬的谣言相比,有很大区别。笔者或许在将来的发表中将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个笔者没能好好处理,或者说,一个至少笔者意识到却未能处理好问题,是勾画出这些故事产生巨大恐慌的特定历史语境。进一步的研究使其变得可能,但笔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毕竟,原始的文献并不能揭示所有细节。不过,笔者希望自己是错的。研究更多的例子,发现更多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推动口头沟通的研究。

总之,笔者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像笔者欣喜地写作此书一样,欣赏本书。笔者写作此书是基于对口头文化重要性及其威力的深信,希望对这一领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田海(Barend ter Haar) 撰

孙英刚 译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本书考察的话题	8
第二节 理论框架	13
第三节 本书内容与结构	25
第二章 麻胡和老虎外婆	34
第一节 以男妖警告孩童	36
第二节 打 Yehu	42
第三节 老虎外婆：历史证据	47
第四节 老虎外婆：20 世纪的口头传说	63
第五节 比较研究	71
结论	80
第三章 攫取器官与盗窃胎儿	84
第一节 樟柳神	86
第二节 关于器官盗窃和绑架的早期谣言	97
第三节 本土的替罪羊	106
第四节 随意散播的谣言与驱魔式的杀害	122
结论	136
第四章 作为替罪羊的西方人	139
第一节 口头文化的重要性	142
第二节 1891 年长江流域的暴乱	159

结语	171
第五章 魔鸟和恶毒的狐狸	182
第一节 可恶的狐狸,恐怖的回煞和恶灵袭击	184
第二节 由黑眚或截发者引起的恐慌	195
第三节 关于故事的传播	229
第六章 妖妇和邪帝	254
第一节 旱魃	256
第二节 对后宫选秀的恐惧	268
第三节 作为结论的观察	285
第七章 传播与污名化	288
第一节 口头传播的能量	289
第二节 故事及污名化	300
第三节 惊恐因何发生	306
第四节 故事传讲及集体行动	308
参考文献	311
索引	346

第一章 绪 言

1

这是一本关于一些令人不安的故事的书,这些故事在传统中国的地方民众中口耳相传,地方民众根据这些故事采取的行动往往具有深远影响。这些故事是过去帝制中国时期的“民间传说”(folktales)及“都市传奇”(urban legends)。本书将仅仅聚焦于这些可怕的故事中的少数几则,贯穿这几则故事的中心线索都包含某种生物(其定义在不同时代及不同背景中各不相同),此种生物要为某些对个体生命或对家庭和社群的延续构成直接威胁的暴力及破坏性行为负责。这些恐惧以故事(消息)的形式传播,对此我们如今(或当时一些人)倾向于给其贴上“谣言”(rumours)的标签。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故事以当时人类交通可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在整个地方社群或更大范围内扩散。起初,这些故事里的所谓罪魁祸首是可怕的存在(被贴上“鬼”[demons]或者“野蛮人”[barbarians]的标签),它们居住在中国社会的外部或边缘地带,对它们的描述也非常相似。这些生物可以被视而不见,或者径以某种驱邪仪式驱逐出去。但是,在历经多个世纪以后,中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的恐惧投射到自己社会内部处于边缘地位的真人身上,这些人成了替罪羊或者中国的“内鬼”(inner demons),经常为暴民们杀害,或在国家的协助下被处决。

*

为了对后面的研究作铺垫,我会先讲述几个发生于 1519 年至 1521 年间、在明代中国的很多地区广为流传的故事。这将让我们大致了解这些故事的巨大影响力、它们令人骇异的性质以及我们从现代视角解释它们时面临的困难。1520 年(正德十五年)是正德帝^①统治的最后一个完整

①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不同方式指称一位皇帝。使用皇帝的谥号记述有关该皇帝生前的内容容易引起时间上的错乱;事实上,在晚期帝制时代,普遍用年号指明朝与清朝的皇帝。

2 的年份,这位皇帝是给后世史官留下相当差印象的明朝统治者之一。1519年末,这位没有子嗣的皇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最后在南京住了大约8个月。^①这并非正德帝第一次离开北京长期居住异地,但他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作为国家仪式中心(ritual centre)的北京更为遥远。因此,正德帝的这次旅行不出所料地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当时广为流传的三个故事中,有两个与朝廷部门有直接关联。

此前数十年,波及中国北方很多地区的暴力活动频发,直至最近的1513年才被镇压下来,但局部规模的有组织的掠夺性暴力活动依然如故。^②1519年,旨在推翻正德帝统治的宁王叛乱被平定,宁王被捕,并最终在1521年1月13日被赐自尽。正德帝于1521年1月18日回到北京,意欲移居另一更靠北的宫殿,但随即一病不起,很快便驾崩了。^③因此,在1520年左右,中国北方,尤其是北京地区的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未来忧心忡忡。这为林林总总的故事和消息(“谣言”)创造了最为理想的扩散环境。^④从长远来看,因为明朝晚期人们视正德朝为大明帝国由盛及衰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普遍对其怀有眷恋之情,所以正德朝的某些故事也生动地留在了史书中。当时人们一般认为,在正德朝之前,旧秩序仍旧完好地运行着;而在正德朝,道德习俗、社会和谐、家庭生活及其余种种都开始分崩离析。这种看法与我们如今所认知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但它确实对其后的历史记忆产生了影响。^⑤

有个故事发生于太监吴经1519年末抵达扬州之时,吴经此行的目的是为皇帝及其随从人员寻找一处壮丽的驻跸之所。皇帝本人于农历腊月初一这一显然具有重要仪式意义的日子抵达扬州这座大城市。据《实录》

① 见盖杰民(James Geiss)的著作 Geiss (1988a) 432。Geiss (1988a) 403 - 439 讨论了统治及传统史学。编者按:本书所引论著仅注作者及发表或发行时间。论著具体名称、版本、出版信息等可见书末所附“参考文献”。

② 见鲁大维(David Robinson)的著作 Robinson (2001)。

③ Geiss (1988a) 423 - 430, 435 - 436。

④ Geiss (1988a) 432 - 433 把这些故事视为真实事件,但是我在后面章节的分析将充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⑤ 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著作 Brook (1988) 144 - 152, 220。

记载,“经矫上意,刷处女寡妇”(吴经假托皇帝的用意寻觅处女、寡妇)。结果,人人争相发嫁未婚之女,以免此灾。据《实录》记载,扬州府知府“诣吴经恳免”,但徒劳无功。《实录》中的这条记载写得恍似两人谈话的原始记录,显示这件事多多少少出于虚构。据说,太监吴经随后强制令这些女子离开家庭,并把她们送入尼寺。一些女子获家人赎买得以出去,但那些贫穷的女子则被关入皇帝的临时驻蹕之所。^①几个月后(第二年的农历三月),该谣言于江南地区广为流传,所到之处俱激起同样的破坏性影响。^②除了那段明显出自虚构的谈话,《实录》该条最后有关只有富人才能脱身的道德哀叹也暴露了未具名的作者们(例如《实录》的这条材料的实际纂录者们,以及之后对其进行加工的编撰者们)的儒家卫道士身份。实际上,这件事既不是同类事情中的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类似事件早至977年,晚至1715年均有关记录,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大规模的婚嫁潮。

出于同样的背景,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准养猪的敕令,致使天下民众大举杀猪。《实录》在敕令发布的当天,即皇帝经扬州到达仪真时,便将其记录下来。^③据称有人(但没有明确指出是谁)下令,“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皇帝巡幸所到之地禁止民间养猪)。其结果是猪被屠杀殆尽。农人将自己的猪赶入水中溺毙。该年仪真的地方官被迫以羊代替猪充作祭品。^④

据当时的内阁首辅之一杨廷和的记录,在正德十四年冬(即1519年

① 《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1页a。整条记载以“云”字结尾,明确显示了这条材料出于道听途说的性质。

② 俞弁《山樵暇语》卷九,第6页b—第7页a(收入《涵芬楼秘籍》第8册);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三,第10页a(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也记录了一条没有明确日期的选秀女的风波,可能即指此处提到的这一例子。

③ 《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第1页a(关于婚嫁谣言的条目)及第6页a。

④ 《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第6页a;孙继芳《矾园稗史》卷二,第9页b—第10页a(收入《涵芬楼秘籍》第10册)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信息。该作者还提供了湖南省的信息。俞弁《山樵暇语》卷九,第5页a—b(收入《涵芬楼秘籍》第8册)记载,1519年不准杀猪的禁令开始有所松动,后来又取消了。《黄岩县志》(1579)卷七,第21页b(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编》,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1982年)把禁令与1518年联系起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页将这道禁令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一起记录下来。

底或者 1520 年初),有一道有关此事的上谕。尽管杨廷和通常将那些传播范围很广却难以置信的故事明确标为“谣言”(原文作“讹言”),但是他并未将这件事也贴上此标签。^① 看起来他对如何为此事加上合适的标签犹豫不决,但他接下来的做法以及他描述这则故事的方式,强烈暗示出他并不相信这真是上谕。该故事是经由军事部门,而不是更为合适的行政部门的渠道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这也显示出其中有某些不太妥当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

十四年冬,上在扬州,有上曰禁民间养猪。云食猪肉病疮。又云音同国姓。盖为回夷于永、写亦虎仙辈所惑也。军门遂移文两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处巡抚官榜谕禁约……

意为:正德十四年冬,皇帝在扬州,有上谕禁止民间养猪。据说吃猪肉会生疮。又据说“猪”字的读音和国姓“朱”相同。归根结底,皇帝是被于永、写亦虎仙等人迷惑。军门遂移文南直隶、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巡抚,张榜晓谕这项禁约……

杨廷和接着描述了这些榜谕对社会及政府造成的影响。他与另一位官员联名具奏,请求废除这道禁令。另外,他自己也积极向司礼监和东厂的太监以及都察院官员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京城内外张榜公布并实施这项禁令。^② 他通过将这些谣言归罪于于永、写亦虎仙等人以降低这些谣言的可信度,并且因之有了方便的替罪羊来解释谣言的起源。早在得到来自扬州的确认之前(这需要少则几天、多则几周的时间),杨廷和即在

① 杨廷和类似的做法有两处记录,分别见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三,第 4 页 a(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28 册,第 801 页),第 10 页 a(第 804 页)。

② 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三,第 36 页 b—第 37 页 b(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28 册,第 817 页)。《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第 2 页 a—b 里包括了这道奏折。其以注意到近日有传言提及一些官员收到一道圣旨开始,尽管通常来说他自己也应该被直接包括在这些官员里。奏折里没有特别提及杨在京城非官方行为,仅仅要求皇帝再下一道圣旨来取消早前发布的那道。杨的奏折虽提及以年份配以特定动物的习俗,但无论 1519 年还是 1520 年都不是寅猪之年。